

# 清代中葉士大夫之憂患意識

王 聿 均

## (一)

本文旨在探討清代中葉士大夫憂患意識的來源和特點，藉以明瞭它與經世思想、維新思想不可分的關係。所謂清代中葉，以乾隆末期開其端，降至咸豐初年；其間尤著重於嘉、道兩朝。這個時期，是劇烈的轉變時期，外力的挑釁已見端倪，內部的動亂也日趨嚴重，在在引起知識份子的關懷<sup>①</sup>。本文用士大夫一詞以代替知識份子(Intellectuals)，只是我國傳統的用法，並無意於區分兩者的異同<sup>②</sup>。實則，士大夫也就是知識份子的精英。在中國的傳統中，士大夫可分為兩種類型，就是「仕」和「隱」<sup>③</sup>，前者為積極用世，後者為消極遜世，用世在立功，遜世重敦品或立言，但這兩種類型時常交替變化，並不固定。本來在儒家的思想中，入世與出世乃一體的兩面，身在廟堂，心在江湖，或身在江湖，心憂天下，這種情形，勿寧是很自然的。所以本文所稱的士大夫，包括在朝與在野的兩方面，但較為偏重民間，盡量不包括朝廷的重臣在內。列舉的代表人物，雖多有在清廷任官的，但位不至宰輔、疆圻，他們或為六部主事，或為地方州縣，或為疆吏幕府，或主講書院，或歸隱田園，在現實政治上的作用微乎其微，可說無足重輕。但他們多負清譽和時望，著述豐富，影響深遠；換言之，他們在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力，是可以肯定的。有清一代的學術派別，約有數家，思想潮流的方向不同，意識形態亦各有差異<sup>④</sup>。本文所

① 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第一分冊胡秋原序。中研院近史所編，六十一年十一月出版。本文所指清中葉，略同於此書第一輯所涵蓋之時間，惟上溯至乾隆末期。

② 六十九年八月十五日，中研院舉辦之國際漢學會議歷史考古組第二分組中，有「中國知識份子討論會」(Panel on Chinese Intellectuals)，參加者之論文多以某朝代之知識分子為題，本文沿用傳統之用法，仍用「士大夫」一詞。

③ 李辰多著，文學與生活，第一講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四十三年出版。著者分析中國士大夫仕與隱兩種類型，見解極為精闢。

④ 唐君毅著，中國哲學原論，原教篇第二十章第八節「清學之方向及其七型」，頁六九六——七〇八，新亞研究所六十四年一月出版。列舉費弘道、顏習齋、戴東原、章實齋、阮元、莊存與諸家之思想，而闡述之。

討論者僅限於嘉道以還的今文學家，以及和他們關係密切的友人，這些人彼此間都有極深厚的友誼。其名重一時者計有數十人，茲將其中十人列表說明於下<sup>⑤</sup>：

姓	名	別	號	籍	貫	出	身	生	卒	年	代
劉	逢	祿	申	受	江蘇	武進	進	士	1776—1829		
魏		源	默	深	湖南	邵陽	進	士	1794—1857		
龔	自	珍	定	庵	浙江	仁和	進	士	1792—1841		
包	世	臣	慎	伯	安徽	涇縣	舉	人	1775—1855		
姚		瑩	石	甫	安徽	桐城	進	士	1785—1852		
徐		松	星	伯	大興	(北平)	進	士	1781—1848		
李	兆	浴	申	耆	江蘇	陽湖	進	士	1779—1841		
陳		沆	太	初	湖北	蘄水	進	士	1785—1826		
胡	承	珙	墨	莊	安徽	績溪	進	士	1776—1832		
賀	長	齡	耦	耕	湖南	善化	進	士	1785—1848		

以上僅是抽樣的舉例。此外如夏璜，錢塘人，宋璠（魯珍），建德人，彭文敬（蘊章），長洲人，陳奐（碩甫），長洲人，李復軒（學璜），上海人，莊卿珊（綬申），武進人，宋翔鳳（于庭），武進人，江沅（鐵君），吳縣人，楊懋建（常生），嘉應人，蕭令裕（枚生），江蘇淮陰人，以及吳虹生（葆晉）、蔣彤（丹棧）等，也都是一時之選<sup>⑥</sup>。歸納起來說，他們所處的時代為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前半期，也就是適逢變局的開端，他們見微知著，恍然心憂。而各抒懷抱，希望能有所匡濟。他們當中，進士出身者，佔十之八九，其餘則為舉人、秀才等<sup>⑦</sup>，可見知識水準之高。就籍貫的分佈而言，多為江南人，以江、浙、皖居第一位，湘、鄂次之，僅徐松係大興（北平）人，蕭令裕係蘇北人，可見這些覺醒的士大夫地理分佈之大概情形。他們彼此間或為師弟，或為摯友，對學術和世局有相同的認識，聲氣相投，酬應唱和，極為頻繁，每每藉譚遊以抒湮鬱之懷抱<sup>⑧</sup>。他們雖然僅係道義和情

⑤ 此表係參考龔定庵全集類編所附吳昌綬撰「定庵先生年譜」（世界書局文學名著第三集第十七冊，四十九年十一月出版）及 Arthur W. Hummel, *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'ing Period*, Washington, 1943 而製成。

⑥ 同前。

⑦ 例如宋璠之出身為拔貢，李復軒之出身為秀才。

⑧ 吳昌綬「定庵先生年譜」中多記其與友人譚遊之事，如道光十年庚寅，十二年壬辰，兩度約友好「集於花之寺看海棠」，多達十四、五人。又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集卷七，記魏默深留飲於揚州梨園盛事，定庵亦曾來梨園為客。

感的結合，沒有任何政治性的組織，但其影響於知識界者則至為深遠。

旅美歷史學者劉廣京教授精研十九世紀知識份子之維新思想，包括從經世到自強、自強到變法、變法到立憲一連串的變化，將整個晚清維新思想作全盤性的檢討。多年前他曾以「咸同中興與傳統經世思想之窮途」為題，講析傳統經世思想與自強、變法的關係。後又以「晚清維新思想引論」為題，評講魏源與包世臣的經世之學<sup>⑨</sup>。本文則從另一個角度、另一個層次來看今文學家經世思想之特徵，以與劉先生的看法相互印證。

## (二)

憂患意識是經世思想的源頭，也是經世思想的動力，這種意識源於傳統的儒者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使命感，也可說對政治隆污、民生疾苦、國族絕續的關切，而形成的一種責任感。「憂患意識」一詞，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呢？最早從易經中就可得到正確的詮釋。周易繫辭下第八稱：「子曰：危者，安其位者也。亡者，保其存者也。亂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亂，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……子曰：知幾其神乎。君子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，其知幾乎。幾者，動之微，吉之先見者也。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」。注：「吉凶之彰，始於微兆」。疏：「幾，微也」<sup>⑩</sup>。繫辭下第八又稱：「易之興也，其於中古乎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」。「易之為書也，廣大悉備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……道有變動，故曰爻，爻有等，故曰物，物相雜，故曰文，文不當，故吉凶生焉。易之興也，其當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，當文王與紂之事邪，是故其辭危。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傾，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廢，懼以終始，其要无咎。此之謂易之道也」<sup>⑪</sup>。易經的觀念，可說是憂患意識的胚胎，其特點有二：一為知幾。在安中見危兆，治中見亂象，始可防患於未然。憂患意識也就是洞識機先的卓識，從細微的徵象而觀察出世局的大趨，預謀應付憂患之道。二為變動與創新。易興於中古，起於憂患，鄭康成注周易，以文王為中古，注曰：「文王因而演周易」。可見「中古」

<sup>⑨</sup> 六十一年春，劉廣京教授訪問近史所，在討論會上講演「咸同中興與傳統經世思想之窮途」，提出其精湛的見解。六十七年九月初，又以「晚清維新思想引論」為題，作了一次公開講演，主要在論魏源與包世臣的經世之學，認為在鴉片戰爭以前，他們已有了改革和維新思想，這種思想自有其傳統，並非受到外來的影響。

<sup>⑩</sup> 周易鄭注，繫辭下第八。叢書集成初編，商務印書館出版，民國二十五年。

<sup>⑪</sup> 同前。

就是殷的衰世和周的盛德之間的過渡時代，也是劇烈變動的時代，略同於近代英國史家湯恩比（Arnold J. Toynbee）所稱的「困擾的時代」（Time of troubles）<sup>⑫</sup>。如何趨吉避兇，逢兇化吉，皆在人之自為，所以憂患意識的勃鬱憤發，就可開創新的世運。上述的一些今文學家，頗能把握易之精義，從他們的著作中找例證，可說不勝枚舉。龔定庵詩云：「蒼生氣類古猶今，安用冥鴻物外吟？不是九州同急難，尼山誰識憮然心」<sup>⑬</sup>！龔詩以古類今，正說明嘉道諸子憂患意識產生的淵源。

其次，明末清初的經史、經濟等實學，以王船山、黃梨洲、顧亭林等為代表。他們的思想，對嘉道今文學者的經世之念，有着直接而又深刻的影響。顧王諸人以當時天下的事勢已經形成，短期內甚難望其改變，唯獨學術的方向，則是人力所能為的，此乃百世之業，在逆流洶湧之中，仍可守正而不陂，起衰振弊，開啟世運。這正是儒者基於憂患意識而產生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。王船山在「宋論」和「讀通鑑論」中表現此種意識特別強烈。他論歷史時，特別重視文化的流嬗，世運的昇降，生計的裕絀，學術的隆污，政制之得失，刑律之變遷，風俗的良窳，教化的興替等各方面<sup>⑭</sup>，認為「君道在焉，國是在焉，民情在焉，邊防在焉，士之行口以無辱者在焉，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」<sup>⑮</sup>。這樣纔可以因勢轉勢，安固天下，負擔歷史文化的重任。黃梨洲所重視的，為內政的制度。他的「明夷待訪錄」一書，主張仿周代的鄉校，在各州縣皆設立學校，以為講學議政的場所。「郡縣朔望，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，學官講學，郡縣官就弟子列……郡縣官政事缺失，小則糾繩，大則伐鼓號於眾」<sup>⑯</sup>。他的用意在使學者本着學術的議論，影響於現實政治。顧亭林的「日知錄」和「天下郡國利病書」，都是藏說理於述事。前書敘述史事，偏重在觀風俗隆窳的變遷，舉凡「經義、史學、官方、吏治、財賦、典禮、輿地、藝文之屬，一一疏通其源流」<sup>⑰</sup>。後書詳述全國各地山川民風物產，意在指出天下安固之道，在於因地制宜，興利除弊。開日後人文地理學之先聲。

無論王船山的「觀世運」，黃梨洲的「重內制」，顧亭林的「觀風俗」，都是親自然流露出由憂患意識而激發的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之情懷，「則古稱先，

<sup>⑫</sup> Arnold Toynbee, "The Dis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s," Patrick Gardiner, *Theories of History* Oxford University, 1959. pp. 201—205.

<sup>⑬</sup> 龔定庵：「己亥雜詩」第二百九十六首，見「全集類編」第十六卷。

<sup>⑭</sup> 唐君毅：「王船山之人道論」，學原第三卷第二期；「王船山之文化論」，學原第四卷第一期。

<sup>⑮</sup> 王夫之：讀通鑑論後序（四部備要五三）。

<sup>⑯</sup> 黃宗羲：明夷待訪錄（梨洲遺著彙刊本），頁六，學校。

<sup>⑰</sup> 顧炎武：日知錄第一冊，吳江潘耒（次耕）序。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版。

切時弊」<sup>⑱</sup>，直接影響到嘉道諸子。魏源曾在京師與友人何紹基、徐松、馮桂芬、鄭沅香、朱亮甫等二十餘人，公祭顧亭林祠（係紹基集資興建），諸人多賦詩紀念<sup>⑲</sup>，可見其對先賢景慕之情。王國維論清代學術稱，「龔魏二氏實上承乾嘉專門之學，而有清初諸老經世之志」<sup>⑳</sup>。日人百瀨弘亦稱讚魏源為「經世憂國之今文學家，清初顧、黃精神之繼承者」<sup>㉑</sup>。這話實在深中肯綮，亦可看出憂患意識形成的來龍去脈。

### （三）

嘉道士大夫的憂患意識，當以龔自珍、魏源、包世臣、姚瑩、徐松、陳沆等為代表人物，他們彼此間都交稱莫逆，友誼至篤。姚瑩雖不屬於今文學派，然亦好講經世。他們不僅是同一時代的人，而且意識形態極為近似。

清代今文經學的倡導，多為常州學派之功。蓋自東漢末年，服虔、馬融、鄭玄等尊習古文，今文經學因之大衰，西漢博士的學說僅存公羊傳之何休注而已；自此以後，公羊成為絕學者垂兩千年。降至乾嘉時代，學風丕變，武進莊存與（一七一九——一七八八），字方耕，號養恬，為清代今文經學的首倡者，常州學派的始祖。他為乾隆十年的進士，官至禮部左侍郎，先後直上書房、南書房者垂四十年，以乾隆五十三年卒，享年七十歲。著有「春秋正辭」、「春秋舉例」、「春秋要指」等書，俱包括在「味經齋遺書」之內，於六經皆能闡抉奧旨，務明微言大義，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<sup>㉒</sup>。其同鄉後進陽湖李兆洛（申者）、武進劉逢祿（申受）同為常州派之重鎮，李著有「養一齋文集」，劉著有「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」，所謂張三世，通三統，受命改制諸義，始次第發明，這是漢代以來今古文舊案翻騰的第一聲。然而申受的用意，不過以何休注來解說公羊罷了。申受乃存與之外孫，存與有三子，長莊逢源，乾隆三十年（一七六五）舉人，次莊通敏，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

⑱ 同前。

⑲ 苗夔東洲草堂使黔草叙，事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春。

⑳ 王國維：觀堂遺墨卷下，沈曾植七十壽慶序。

㉑ 王家儉：魏源年譜一五一頁。（引歷史公論三卷六號，百瀨弘「清末先覺者邵陽の魏源」。）中研院近史所，五十六年十一月出版。

㉒ 莊存與味經齋文集，魏默深撰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叙稱：「清之有天下……百餘年間，以經學名家者，先後凡數十輩，武進莊方耕先生以經學傳成親王於上書房，十有餘年，講輟敷陳，莊吐道誼」。又陸寶千著：清代思想史第六章「清代公羊學之演變」，第二二三——二二七頁。廣文書局六十七年三月出版。又 Arthur W. Hummel, *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'ing Period*, pp. 206—208, Chuang T'sun-yü (莊存與條)。

二) 進士，幼莊選辰，乾隆四十三年(一七七八)進士。侄莊述祖(葆琛，一七五一——一八一六)，乾隆四十五年(一七八〇)進士，著有「珍藝宦遺書」，其屬於公羊者，有夏小正經傳考釋。孫莊卿珊(綬申，一七七四——一八二九)，從外孫宋翔鳳(于庭)，都是常州派的後起之秀<sup>23</sup>。翔鳳著有「浮溪精舍叢書」(包括論語說義在內)。綜觀存與所傳公羊之學，僅限於子侄、孫及外孫輩，至逢祿、翔鳳而始光大<sup>24</sup>。然他們仍沿清初學者重注疏之學的傳統，惟以西漢經師之意說經，離不開我國傳統學術的範疇。可是今文經學，傳到龔自珍、魏源，卻有了極大的改變。

龔、魏二氏皆曾從劉逢祿學公羊春秋，大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<sup>25</sup>。定庵自記年二十八歲，始親受教益，這等於已有師弟之誼。默深雖非正式拜在逢祿門下，但問學問道，可說是同一師承。龔、魏也就與常州派有了密切的關係。可是時代不同了，誠如梁任公所論：「龔、魏之時，清政既漸陵夷衰微矣。舉國方沉酣太平，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，恆相與指天畫地，規天下大計。故雖言經學，而其精神與正統派之爲經學而治經學者則既有以異。……故後之治今文學者，喜以經術作政論，則龔魏之遺風也」<sup>26</sup>。觀龔、魏與前人最大不同之處，厥爲由說經而轉於著重說世事之變，因而與史有了密切的關連。龔自珍的「古史鈞沈論」，就有九流六藝皆出於史的論調，他說：「周之世官大者史，史之外無有語言焉，史之外無有文字焉，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」<sup>27</sup>。看起來頗似章學誠(實齋)「六經皆史」之說。然而龔魏的論史，不單是談過去，而且更進一步的評論當代的政治，和章學誠僅只意在建立他自己的史學義法，從未曾談及時政者，無論在史的內容上，方法上和著述的動機上，都是截然不同的。這當與龔魏所處的時代，有極其密切的關係。龔魏之評及時政，有內外兩重因素，外爲西力入侵所帶來的影響和刺激，內爲政治的弱點漸次暴露，使其深感不能已於言。不過龔魏的評及時政，有很多無形的限制，仍無法逾越一定的範圍或尺度。

龔自珍才氣縱橫，他所寫的詩文，自謂在觀世運之幾，取易經之義。其「賦憂

<sup>23</sup> Arthur W. Hummel, *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'ing Period*, 莊存與條。

<sup>24</sup> 陸寶千著：清代思想史，第六章第二二三——二二七頁。

<sup>25</sup> 吳昌綬：「定庵先生年譜」嘉慶二十四年己卯：「春應恩科會試，不售，留京師，始從武進劉申受禮部受公羊春秋，遂大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」。又龔定庵全集己亥雜詩第五十九首自注：「年二十有八，始從武進劉申受公羊春秋。近歲成春秋決事比六卷，劉先生卒十年矣」。又劉逢祿劉禮部遺集卷十一，題浙江湖南遺卷之詩，對龔、魏之文，盛加稱道。王家儉「魏源年譜」第三十八頁，記有「先生與龔自珍皆今文學派之健者，又嘗問學於劉逢祿，因之與常州學派淵源極深」。

<sup>26</sup> 梁啟超：清代學術概論，第五五——五六頁。中華書局四十五年臺北版。

<sup>27</sup> 龔自珍：古史鈞沈論二，龔定庵全集類編，第九十九頁。

患」一詩云：「故物人寰少，猶蒙憂患俱，春深恆作伴，宵夢亦先驅。不逐年華改，難同逝水徂，多情誰似汝，未忍託禳巫」<sup>⑳</sup>。此詩寄情深遠，憂患之思，如影隨形，流溢於字裏行間。在「龔定庵全集類編」論辨類中，有「乙丙之際箸議」、「壬癸之際胎觀」、「乙丙之際塾議」等篇，「乙丙」係指嘉慶乙亥、丙子兩年（即嘉慶二十年及二十一年），他所見者為水災、河決、民窮、帑匱，都是一片衰敗的現象。因稱：「子亦知物極將返乎。天生物，命官理之，有所潰，有所鬱，鬱之也久，發之也必暴」<sup>㉑</sup>。又稱：「王治不下究，民隱不上達，國有養士之賢，士無報國之日，殆夫殆夫，終必有受其患者」<sup>㉒</sup>。「才者……蚤夜號以求治，求治而不得，悻悻者則蚤夜號以求亂，然而起視其世，亂亦竟不遠矣。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，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，……履霜之屨，寒於堅冰，未雨之鳥，威於漂搖，痺癆之疾，殆於癰疽，將萎之華，慘於槁木」<sup>㉓</sup>。「壬癸」係指道光壬午、癸未兩年（即道光二年及三年），這時亂萌漸著，他憂心忡忡，情見乎辭，一則稱：「大人之所難言者三，大憂不正言，大患不正言，大恨不正言。憂無故比，患無故遯」<sup>㉔</sup>。又稱：「智慧之所出，憂患之所入，入亦無算數，出亦無算數。雖則用智，慘然而哀，雖則用慧，慘然而哀。或則抱憂而食患，不忍用智慧焉而哀；或則介憂而胃患，忍用智慧焉而哀。」<sup>㉕</sup>。自珍之言因有忌諱，故較隱晦，于世運之幾上，見清室由治世而淪於衰世，更寄其無限深慨與遙情。綜觀龔氏之憂患意識，多因觸及清廷內治的腐敗而產生，他對西方的認識極淺，林則徐奉命赴粵查禁鴉片，他的獻策，甚為幼稚<sup>㉖</sup>。想隨則徐赴粵，又被婉拒<sup>㉗</sup>。他卒於道光二十一年辛丑（一八四一），享年僅五十歲，也無機會深入的了解西方。

魏源的憂患意識，也是從幾先着眼，表現其不勝憤與憂之情。但與龔氏略有不同。默深有此意識，主要由於外來的刺激而產生。他留心經世之學，早歲曾佐江督陶澍，改革鹽務、漕運，興修水利<sup>㉘</sup>。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）入裕謙幕，及裕謙

⑳ 龔自珍：「賦憂患」詩（丙戌）。見前書，第三三四頁。

㉑ 龔自珍：「乙丙之際箸議」第一。見前書，第六五頁。

㉒ 同前，箸議第六。

㉓ 同前，箸議第九。

㉔ 龔自珍：「壬癸之際胎觀」第六。見前書，第一一二頁。

㉕ 同前，胎觀第七。

㉖ 龔定庵全集定庵文集補編卷四，頁二——四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「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」。

㉗ 同前書。林則徐復龔定庵札，略稱：「至閣下有南遊之意，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，而事勢有難言者，囑敵本家帖膽主政代述一切，想蒙清聽」。

㉘ 王家儉：魏源年譜，第五三——五四頁。道光十二年壬辰，「陶澍延議淮塩改革」，同時參與其議者，尚有包世臣、姚瑩諸人。按陶澍係於道光十年，被擢任兩江總督。

殉國，給他的震撼甚深。復受林則徐的囑託，纂輯「海國圖志」，以覘中國在世界之處境與形勢。此書原序為世人所熟知，包括了三層意義。其一為師夷長技。「是書何以作？曰：為以夷攻夷而作，為以夷款夷而作，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」<sup>37</sup>。其二為憂患與發憤。「故君子讀雲漢、車攻，先于常武、江漢，而知二雅詩人之所發憤；玩卦爻內外消息，而知大易作者之所憂患。憤與憂，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，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，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」<sup>38</sup>。其三為天時人事的倚伏相乘。「天時人事，倚伏相乘，何患攘剔之無期，何患奮武之無會，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，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劃也」<sup>39</sup>。從他海國圖志的自序中，可以看出從憂患到憤悱，從憤悱到講劃，乃是經世的三部曲。換言之，憂患意識為一種精神的動力，靠着它傾否之泰，違寐之覺，革虛之實，進而講求攻夷、款夷、制夷之道。他的海防思想、經世思想、維新思想，都是由憤悱而產生者。龔、魏二人，於道光初年相識於京師，慷慨激發，暢談時務。繼又於揚州黎園<sup>40</sup>重聚，講論經史，交往甚密，友誼至篤，彼此在思想上，自然會相互影響。惟龔氏早卒，他的憂患意識僅停留在傳統觀念的範疇；魏氏目睹鴉片戰爭之失敗，英軍長驅深入，迫訂城下之盟，形成數千年來一大變局，焉能不怵然心憂？故其憂患意識，尤富有時代的意義。始而曰：「塞其害，師其長，彼且為我富強。舍其長，甘其害，我烏制彼勝敗？奮之奮之，利兮害所隨，禍兮福所基。吾聞由余之告秦穆矣，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，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」<sup>41</sup>。繼而曰：「盡收外國之羽黨為中國之羽翼，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。富國強兵不在一舉乎？時乎，時乎，惟太上能先時，惟智者能不失時。又其次者，過時而悔，悔而能改，亦可補過於來時」<sup>42</sup>。蓋此時默深之思想，已由憤悱轉至講劃，已由觀念而轉為實際矣。龔、魏之外，重要的人物尚有包世臣。他好經世之學，於漕、河、鹽務、權酷，無不留意。他享年八十歲，一生飽經憂患，經驗豐富，著有「安吳四種」三十六卷。於英商的販賣鴉片及英軍的佔領新埔（新嘉坡），皆感疑懼，在其致姚（亮甫）中丞書中謂：「目前無事，正可苟安。一官如傳舍，安能遠慮百年？輕犯禍始，是則非世臣所敢知也。……十數年

<sup>37</sup> 魏源：海國圖志卷首「海國圖志原叙」。

<sup>38</sup> 同前。

<sup>39</sup> 同前。

<sup>40</sup> 魏源於道光十七年在揚州倉巷，購園一所，有竹木池亭，養魚飼雀，奉祖母以居，題名曰「黎園」。見陳世鎔求志居集卷二七。

<sup>41</sup> 海國圖志卷三十七第一頁，「大西洋歐羅巴洲各國總叙」。

<sup>42</sup> 魏源：聖武記，道光三十六年第二次重訂本「道光洋艘征撫記」下，頁三二五——三三六。



後，雖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，必至以憂患貽君父」<sup>④</sup>。這封信是道光八年四月寫的，在鴉片戰爭前十餘年便有這樣高瞻遠矚的看法，可謂洞燭機先。此外姚瑩（石甫）雖曾居較高官位，但一直都不得意。尤其任臺灣兵備道時，曾在鷓籠海口，誘沈英船，江寧議款，以「妄殺夷人冒功」，曾被逮入獄。因其仕途蹭蹬，「一生崎嶇挫折，不肯趨倚權貴，不肯媵阿隨俗，當患難出獄之際，諸顯要貴公欲一過其門而不肯往」<sup>⑤</sup>。所以將其納入龔、魏之列。何況姚瑩自記與龔、魏訂交情形甚詳，略稱，道光初，於京師交邵陽魏默深，建寧張亨甫，仁和龔定庵等，「皆慷慨激厲，其志業才氣欲凌轢一時」<sup>⑥</sup>。尤足證明與龔、魏為同道。姚氏斤斤以人心世道為憂，認為「古今時勢不同，當務為亟。今日事勢可憂可懼如此，似不宜守拘墟之見」<sup>⑦</sup>。

這些經世學者，除了重視海防，也重視塞防。海防思想與塞防觀念並無衝突之處。其源皆出自憂患之一念。清初王船山論安固天下之道，應重邊塞之防，而主「匿武於四方」<sup>⑧</sup>，可說是最早的塞防倡導者，龔、魏皆受其影響。龔自珍撰「蒙古志」十二卷<sup>⑨</sup>，又有「西域置行省議」一文，見解精闢。李鴻章讚之曰：「古今雄偉非常之端，往往創於書生憂患之所得，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於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今日，蓋先生經世之學，此尤其犖犖大者」<sup>⑩</sup>。對之備極推崇。魏源亦注意中國的邊疆，撰有「聖武記」十四卷，歷述清初武功，推求盛衰之理，以「物耻足以振之，國耻足以興之」<sup>⑪</sup>勉國人。姚瑩著有「康輶紀行」，訪察西藏、廓爾喀、印度、俄羅斯形勢，搜集地圖，而成此書，究心夷情，即所以固邊防<sup>⑫</sup>。他們的朋友徐松（星伯）尤精於西域水道之學。著有「西域水道記」五卷，「漢書西域傳補注」二卷，「新疆賦」（長詩）二卷，又成哈薩克、布魯特二表，其長於西北輿地，尤在自珍之上<sup>⑬</sup>。自嘉道以還，中國學者對新疆史地的研究，發生濃厚的興趣，著

③ 包世臣：安吳四種，卷三十五齊民四術；卷一一，頁三——五，「致廣東按察姚中丞書」。

④ 姚瑩：東溪文後集卷八，頁九——一一，「復光律原書」。

⑤ 同前書卷十一，「湯海秋傳」。

⑥ 同前書卷八，「復光律原書」。

⑦ 唐君毅：「王船山之文化論」，「學原」第四卷第一期。

⑧ 吳昌綬：「定庵先生年譜」道光元年記有：「自撰蒙古圖志，訂定義例，為圖二十有八，為表十有八，為志十有二」。

⑨ 合肥李文忠公「黑龍江述略序」。

⑩ 魏源：聖武記序。

⑪ 姚瑩：康輶紀行第五卷「外夷形勢當考地圖」。第十卷「俄羅斯方域二條」。

⑫ 吳昌綬：「定庵先生年譜」，道光元年辛巳條記稱：「徐星伯舍人精於西北地理，先成哈薩克布魯特二表，先生嘆為當代奇作，遂沿用之」。

述之多，超邁前代，率為發抒胸臆憤懣鬱結之情。

#### (四)

上述龔、魏、包、姚等人的言論，僅係略舉數例，以明經世之學的大趨而已。易言之，憂患意識與經世思想實有相輔相成的關係。他們的朋友、同志，聲氣相通，思想相近者，又何止數人或數十人？他們雖無實質的連絡，雖無有形的組織，但卻有精神的契合，由憂患意識出發，而蔚為一時之風氣。綜觀龔、魏等的著論，不同於前人的奏議，不同於早期的公羊學者僅限於經生之業，也不同於昔日的論史者僅於事後評論，以資來日的鑑戒；而多就當今的事變而言，開啟日後的時評、政論之風<sup>③</sup>。他們在世變日亟之際，發為時政的批評，言人之所未言，言人所不敢言，影響至為深遠。

龔、魏上承莊劉（莊存與、劉逢祿），下啟廖康（廖平、康有為），為今文學運動之健者，而以經世致用為依歸。他們承此公羊學之統緒，以論時政，再進一步的發展，則為康有為的本公羊之學，以言變法改制。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，有為聯合十八省舉人一千二百餘名為公車上書，要求改革政治，參與政治，亦與往昔儒者之言變法的方式不同。從董仲舒到王安石，都是由其個人，說服君主，獲得信任，然後始克從事朝政的改革。而康及其弟子和同志雖亦獲光緒帝之賞識，實則欲藉知識份子集體的力量，設法對政治產生影響。這開啟了以後的知識份子互相結合，以作社會、政治運動的先聲<sup>④</sup>。這種風氣，實在是龔、魏等人所開啟的，不過那時僅限於言論，到了康有為，才演變成實際的行動。這對後日的知識份子參政方式，多少會有一種示範作用的。再就學術的層面說，龔、魏的公羊學到廖、康的公羊學，固然是一脈相接，但內容則大異其趣。廖、康都著重孔子的政治理想開「未來世」之一面，不在本文討論之列。

本文之立意，是認為清代中葉士大夫的憂患意識，源自於傳統的儒家文化，即前面所述儒者對天下國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。一切的經世思想、海防思想、塞防思想、維新思想，皆由此而產生。憂患意識的鬱結勃發，是根本的原動力，靠着它推陳出新，接納新思想、新觀念，以開創新局。倘若從此種觀點來看，自強運動的效

<sup>③</sup> 唐君毅：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「清學之方向及其七型」。

<sup>④</sup> 同前。

法西方之船堅砲利，維新運動的效法西方之政法制度，五四運動的引入西方之科學民主，皆不應純粹視之為模倣西法，而其根本仍在中國人之深厚的歷史感和人文理想。所以，憂患意識是落實於整個時代、國家、歷史、文化的層次的。這種看法，甚至到今天，仍然有其鮮活的意義。

